

辛亥百年的南京记忆之作家视角

1415

——邹容《革命军》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

作家眼中的辛亥革命与南京

叶兆言



江浙联军占领北极阁 资料图片

辛亥革命南京大事记

1911年11月24日
江浙联军会攻南京。

1911年12月2日
江浙联军攻克南京。

1911年12月12日
十四省代表齐聚南京开会。

1911年12月17日
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1911年12月29日
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3日
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省代表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1912年1月11日
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黄兴为北伐军陆军参谋长,并组成六路北伐军。

1912年1月22日
孙中山宣布“如清帝退位,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当即辞职,并推袁为总统”。

1912年2月12日
宣统皇帝溥仪宣告退位,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结束。

1912年2月13日
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辞职,推荐袁世凯为大总统。

1912年2月15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为大总统,20日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1912年3月11日
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体制。

1912年4月1日
孙中山正式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

——邹容《革命军》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

其安全康乐之心。

——邹容《革命军》

——邹容《革命军》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

其安全康乐之心。

——邹容《革命军》

——邹容《革命军》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

其安全康乐之心。

——邹容《革命军》

——邹容《革命军》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

其安全康乐之心。

——邹容《革命军》

——邹容《革命军》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

其安全康乐之心。

——邹容《革命军》

辛亥百年，唤醒了国人的记忆,人们通过阅读书籍、观看影视作品,回望那段影响了20世纪中国发展进程的特殊历史。与此同时，辛亥百年,也激起了一些作家、学者重述历史的欲望。在习惯了诸多宏大叙述之后,一些人开始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和讲述他们眼里的历史。这种叙事方法不再追求“大时代中的大历史”这种叙事抱负,而是着眼于大时代中的某一个片段,某一个片段中的某一些细节。历史不是碎片,但是历史是由碎片组成的。著名作家叶兆言就是一个碎片爱好者。叶兆言不是正宗的南京人,但是在他身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南京情结,他的很多小说写的都是南京人、南京事,他的散文作品《南京人》被誉为“写到南京人骨子里了”。叶兆言还是个历史爱好者,他的许多,特别是关于民国历史的随笔散文,在读者中广为流传。值此辛亥百年,南京与历史相逢之际,叶兆言特地撰写了《辛亥革命与南京》一文,细致入微地呈现了革命年代一座城市的方方面面。——编者



著名作家、南京市作协主席叶兆言

然做好了防范，防患于未然，早早地就将可能闹出事的新军调出了城外，每人只发给三粒子弹。和很多城市不用吹灰之力就轻易拿下不同，南京注定要经历一场血雨腥风。考察整个辛亥革命，南京光复之役不说最惨烈，但是也可以说相当麻烦，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

如果历史允许假设，时间可以倒流，站在清朝的统治者角度看，他们一定会后悔做了两件事。第一，取消科举，这让读书人失去了奋斗目标。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就是一个屡试不中的失意秀才。要是考场得意,让他有了功名,或许就不会给政府添那么大的乱子。科举没了，一代读书人有力无处使,有劲不知道该怎么用，仿佛没头苍蝇，巨大的能量发挥不出来，革命也就在所难免。第二，不应该冒冒失失地做军国主义的梦。大清朝已病入膏肓，虚弱的身子根本禁不起重药，却还妄想建立了一支强国称霸的新军，结果国未强，霸未称，反倒给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朱东润先生的三哥就曾经在新军服役，后来转业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当了狱卒，他的故事非常适合再现当时的历史。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以后，这位思想激进的年轻人开始不安分起来，他与新军的中下层军官秘密联络，约定时间应外合，同时举行暴动。然而新军被突然调往城外，仍然还蒙在鼓里的他按照原定计划起事，时间一到，在监狱里为犯人打开了镣铐，用事先准备好的枪支将他们武装起来，然后呼喊着冲向街头。

因为没有外援，结果就只能壮烈牺牲。从名声来看，朱东润的三哥不能与坎壈和徐锡麟相比，也不能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相比，虽然后来也得到了抚恤金，也算是个英雄先烈，说起来总觉得有点心酸。革命难免会有些牺牲，革命不是做买卖，不可

以讨论值得不值得。然而他的牺牲至少可以说明,光复南京毕竟不是儿戏,还必须有些更有力的行动才行。

辛亥革命的最终成功,完全出乎大家意料。按照革命党人的意愿,革命应该首先在边远地区发动,然后逐步推开,最终彻底动摇清王朝。偏偏事实证明,边远省份的起义,总是微不足道,很容易地就被扑灭。众所周知,发生在武昌的起义更像是一次擦枪走火的意外,革命党人自己都感到手忙脚乱,最后不得不从床底下将黎元洪搜出,白白送了顶革命元勋的乌纱帽给他。

因此,辛亥革命成功,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革命党人如何强大,而是大清朝实在太弱。光复成了多米诺骨牌,因为大清朝太弱,因为它的寿终正寝,很多城市只要揭竿而起,发一篇通告,贴几张传单,就可以传檄而定,立刻光复。巡抚大人摇身一变,又成了本省的最高权力长官都督。城头变幻大王旗,革命成了一场欢快游戏,光复成了最时髦的词。然而骨子里的旧还在,官仍然是官,民依旧是民,知县摇身一变,成了县知事,一字之差,县大爷还是县大爷。

此时的南京却有着特殊意义,天下已经大乱,胜负还在一念之间。袁世凯打电报给负责守城的张勋,说“东南半壁,悉赖我公”,他的意思十分明显,只要南京还在,革命党人就翻不了天。只要南京还没丢,沪宁线上的城市虽然光复,其他省份已经独立,清军随时还可以再收复。这时候,革命已经不可阻挡,但是站在反革命一边的袁世凯却稳操胜算,他的北洋大军挡住了革命党的喉咙，已将武昌团团围住,置于自己的炮火之下,只要他愿意,拿下武汉三镇指日可待。

革命党人也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很显然,辛亥首义的武昌肯定守不住。事实已经证明,在军事上,黄兴督战的革命军根本不是北洋的对手。要解武汉之危,只有尽快搞定南京。“南京一日不下,武汉必危。武汉不支,则长江一带必不能保,满虏之焰炽,祖国亡无日矣!”一时间,南京成了重中之重,于是江浙联军组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实力不得不在此地进行决战。

终于光复了,南京的老百姓开始参与维新,开始兴高采烈相互剪辫子。大家突然发现,原来剪个辫子也没什么大不了,就仿佛闹革命,在不同阶段,有着不一样的代价和结局。清朝留给汉人的辫子,原本和脑袋联系在一起,危险时,剪辫子意味着要丢掉性命,等到大势已去,连袁世凯也与时俱进,剪掉辫子也就是一剪子的买卖。到这时候,水到渠成,剪已经不是什么事,不剪辫子才是个问题。

用旁观者来形容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人,显然有些不够恭敬,事实的真相或许就是如此。南京是两江总督所在地,掌管着当时最富庶的区域,控制着清政府的经济命脉,历来为朝廷所看重。但是南京人根本管不了这些,他们才不在乎自己的城市有着什么样的政治地位,只是以一种十现实的心态,非常平静地去迎接这场革命。不仅平民如此,普通官员也是这种态度。攻打南京的炮声响起之时,除了位于最高层的那几位长官,夹着尾巴仓皇逃跑,大部分官员都静观其变,既不打算直接参与光复,也不准备为大清尽忠殉节。

清道人李瑞清当时的职位是南京两江学堂监督,也就是南京最高学府的校长。考察这样一个文化人的态度,显然有助于我们重新回到当时的现场。李瑞清是中国最早参与高等教育的文化官员,曾经到日本考察教育,戊戌变法以后,新派思想一度落

于下风,保守势力甚嚣尘上,但是随着科举制度取消,废书院,兴学堂,罢私塾,设师范,已成为

得来的,用行家的话说,是野路子。多少年来,我一直是野史的爱好的者,通过旁门左道阅读历史,借助前人的文章和笔记了解过去。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是怎么样,当时的人有些什么心态,重新考察体会,或许会有些新的观点,会有些与流行不同的看法。

当时思想激进的学生,也不过是先悄悄地把辫子剪了。作为大学的一校之长,对待自己的学生,李瑞清既不鼓励,也不阻挡,完全放任自由。在革命军的隆隆炮声中,他唯一的要求,就是照常敲钟上课。天下再乱,认真读书总是不错。他这么做,依然这么固执,很有点书呆子,但是确实不容易。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人骏十分感慨,佩服他的淡定,觉得人才难得,是“诚可寄命任重者”,当即火线提拔,任命他为江宁布政使,官居二品。这是个相当高的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和民政厅长。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李瑞清已不可能大有作为,大局不可能更改,很快,两江总督张人骏跑了,辩师张勋也跑了,美国和日本领事劝李瑞清去外国军舰上暂避,他依然书生本色,没有携款潜逃,而是“封藩库,积金数十万”,静待革命军的到来。南京光复的那天,他衣冠楚楚,奉印端坐在堂上,眼睁睁地看着革命军冲了进来。革命军并没有为难李瑞清,毫无疑问,这样的书生不应该是革命对象。交了布政使大印,回到学校,留校师生奔走相告,欢迎他回来主持学堂。可惜李瑞清不愿与新政权合作,去意已决,遂命人登记校产,抄录清册移付缙绅。上书督府,辞退校长职务,又眼见学生贫寒,衣衫褴褛生活贫困,心中十分痛苦,便卖去自己的车马,所得钱财散给穷学生,随后两袖清风,飘然而去。

四

由于南京是由联军攻打下来,谁来当这个城市的大都督,

便成了一个有争议话题。论功行赏,结果却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革命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平起平坐的机会,拥兵的青年将领都觉得自己功高盖主,革命尚未最后成功,各路英雄好汉已经开始勾心斗角,开始争权夺利。南京光复以后,革命党人纷纷涌向此地,投机者也如期而至。虽然革命还未最后成功,武昌仍然告急,可是这里已经俨然像个官场。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代表四川军政府赶到南京,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像点样子的官衔早就瓜分一空,部长的位置没了,次长的位置也没了。

从光复那一天起,南京就形成了一个大的权利场。不能将李瑞清这样的教育精英为自己所用,显然是新的民国政府的遗憾,在这个问题上,既可以说李瑞清顽固和清高,也可以说新政府根本就没时间没兴趣来网罗人才。新的民国政府有很多事要做,有很多重要的会议要开。由于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南京很轻易地就获得了对辛亥革命的领导权,就像革命元勋黎元洪的遭遇一样,具有金陵王气的六朝古都南京,在各种势力的综合作用下,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

1911年的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为选黄兴还是黎元洪当总统争执不休,获悉袁世凯也赞成共和后,立刻决定暂缓选举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很显然,还处在敌人阵营的袁世凯,才是大家心目中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黄兴这么认为,黎元洪这么认为,孙中山也是这么认为。12月25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由于有比较高的威望,他受到许多革命团体支持,也得到了立宪派和旧势力的认可,一致认为他是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最佳临时总统。因此从一开始,孙中山的大总统前面,就加上临时两个字。

换句话说,袁世凯最后成为正式的大总统,不是一个简单的窃取就可以解释,也不是因为南京的软弱就可以形容,而是代表着当时从上到下的民心。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在最后选择了袁世凯,错也好,对也罢,最终是尊重民意这一点,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周公恐慎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是袁世凯对不起民意,是他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如果在当选大总统之后不久便死去,他或许就真的流芳百世。